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京内资准字0609-L0057号  
北京交大印刷厂印刷

#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5年 第9期  
总第(355)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5年5月15日

## 目 录

全球竞争的文化转向与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

——孔子学院十周年回眸与展望·····杨文艺(02)

中国大学国际化的一个全球试验

——孔子学院十年之路的模式、经验与政策前瞻·····李 军 田小红(10)

全球视野下的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

——为纪念中国孔子学院创办十周年而作·····吴勇毅(16)

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吴应辉(21)

试论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制度化建构·····袁 礼(26)

议孔子学院对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严晓鹏 郭保林(30)

**编者的话:** 2004年11月24日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运作。截至2014年10月底,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已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1所孔子学院和730个孔子课堂,向全球派出了上万名教师和志愿者。孔子学院在汉语教育国际化和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学院是全球竞争形势变迁的国家战略缩影,对中国文化权利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十年过去了,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进程既有成就也有思考,本刊以“孔子学院建设”为选题,总结与思考孔子学院十年发展历程,以飨读者。

主 编: 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 范笑仙      责任编辑: 聂文静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 编: 100082      电 话: (010) 59893297  
电子信箱: gaoyanbianjibu@163.com

# 全球竞争的文化转向与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

## ——孔子学院十周年回眸与展望

杨文艺

在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权力存在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制度权力、知识权力、规范权力等不同纬度。自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全球竞争焦点转向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趋势越加明朗。其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年）、弗朗西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年）、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1999年）、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2001年）等书籍相继向全球释放着秩序重整的信号，其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化权力”置于后冷战时代民族国家全球竞争战略中给予高度重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达了一个思想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重构的见解，“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尽管非议颇多，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与文明等“软力量”已毫无争议地在国际权力竞争中占据了更为显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为国际社会制定国家文化战略提供了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立足“本土”与“国际”双重视野，纷纷调整文化战略以适应国际文化竞争态势。不同的是，在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战略的实现还面临着美国战略重心不断东移所带来的另一重现实考量。这正是孔子学院在2004年成立的国际环境。

###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孔子学院

适应全球文化竞争与“重心东移”的形势，文化“走出去”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层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和任务，并提出把“走出去”作为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文化国际战略一直处于探索和完善过程中，直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布局才基本完成，其中包括“五位一体”战略举措，即以“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格局的形成为目标，重点实施“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构建人文交流机制”“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五个方面的重大工程，至此，我国基本形成全球文化权力竞争的国家战略。

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汉学大众化传播体系初步建立。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文件、“指导性”政策与“专门性”文件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其中的重要文件包括《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政策；专门性文件方面，从《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到加入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从“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更名、《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制定和修改到《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等，为包括孔子学院战略部署提供了专门性指导。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国家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并实施了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中国出版物

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2010年实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设立）为主体的五个国家重大项目。五个重大项目通过出版资助、翻译资助和渠道建设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文化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基本完善并付诸实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行动和越发明朗的文化战略与文化自觉。

语言与教育输出的诸如国家形象塑造、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方面的功能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也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创领导全球之能力的教育：国际教育和外语教育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等文件将语言教育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世界领袖”培养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对外文化和教育”是其对外政策的第三支柱，有效调动了政府、社会和民间三重力量参与国际文化传播，联邦外交部、各州政府、教会、工会、体育协会、各政党作为政府力量在文化权力角逐中发挥着顶层设计功能，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对外关系协会等民间组织执行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绝大部分任务，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等中介机构也都执行这方面的使命。而在法国，语言输出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首要政策工具和政策基石。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就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直到今天，推广法语仍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核心。

孔子学院是全球竞争形势变迁的国家战略缩影，适应了语言与教育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文化权利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早在1991年，季羨林先生就在其《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书中预言：“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诚然，经历了十年的探索式发展，孔子学院在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规模扩张和渐次展开的质量提升动作初步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和东方文化品牌的形成，但是，也招致了来自国内外的广泛质疑。英国文化协会负责人马丁·戴维森惊讶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式上“宣传”：“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想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用正面的宣传来对抗负面的宣传。他们用的是‘宣传’这个词。”西班牙《对外政策》杂

志对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新文化外交”评论道：

“中国近年来发起的文化外交‘魅力攻势’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一切迹象表明，中国要达到欧洲和美国的声誉和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江村等人提出了孔子学院“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有效推广”问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宽则对孔子学院“在不自觉中有可能适应并强化了后殖民批评所说的‘东方主义’模式”表述隐忧。

应该说上述质疑反思了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启示性，然而又都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事物螺旋式上升的阶段性的。单从国际知名语言和文化输出机构建立的历史来看，法国法语联盟建于1883年，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德国歌德学院创办于1951年，即便是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1991）距今也有25年的历史了。相比之下，孔子学院2004年创办至今也仅有十年历程，摈弃“数字崇拜”的嫌疑，十年里在122个国家建立起的445所孔子学院和680个孔子课堂的全球布局及其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至少让“中华文化”这个迟到的世界文化成员跻身于“国际文化占位”领域。而2013年孔子学院发展史上最显著的系列变革似乎也昭示了转型的趋势：①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颁布实施了针对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五个文件”，标志着经历了十年探索和积累，孔子学院国内汉语师资队伍走向成熟；“支持外国高校设立汉语师范专业”举措的推出，则标志着“师资本土化开发”的开始，是孔子学院从“跨国教育”迈向“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步骤。②教学资源方面，修订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开发了《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简称《指南》）网络平台，两者在孔子学院教材和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前者在弱化“语言本体知识”教学的同时，突出国际汉语教学的“实用性”；《指南》网络平台则依托大数据和数字处理技术，自动生成汉语教学和学习需要的讲义和教辅资料，是各种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突破，将有效解决适用教材紧缺对孔子学院教学质量提升的制约问题。③数字化建设方面，2013年正式上线了数字图书馆、数字教学案例库，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已开设包括“学习”“考试”“文化”“在线图书馆”“教学资源”“汉语桥”“教材编写指南”在

内的7个频道，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为汉学大众化奠定了基础。④开发了针对国外高端群体的“孔子新汉学计划”与“青年领袖”项目，开启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标志着孔子学院办学路线更加自觉。对孔子学院十年磨砺，许嘉璐指出：“孔子学院事业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

## 二、转型的新课题：转向哪里

转型发展势在必行，然而怎么转型？转向哪里？这些都因复杂的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经济等因素的杂糅和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而变得难以一言以蔽之。在这方面，国际文化传播战略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针对中国文化、国家形象的国际误读，倪宁认为“究其原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缺乏全方位、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此，黄会林、漆谦则提出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的“第三极文化”推广战略；在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方面，郭可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展示目前我们真实的甚至可能有点缺点的文化现状”的观点。在怎样传播的策略方面，张昆提出“整合传播”策略，认为“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仅仅依赖于官方的主流媒介，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文化交流、旅游、体育比赛、影视剧等，都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杨金海则提出文化走出去需处理好“五大关系”，即“把政府的推动和学者的推动结合起来，把政治交往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把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结合起来，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结合起来。”学界较早的实证研究在谋划孔子学院的文化版图时也提出，应在“淡化官方色彩”“丰富传播手段”“塑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当代中国为主”等方面有所作为。得益于此，笔者主张在坚持“全球视野，本土行动”原则的基础上，以“大文化”观重新梳理孔子学院在“做什么”与“怎么做”方面的顶层设计。

（一）输出内容：语言教育基础上的“大文化”

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鉴于此，二战后语言与教育输出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文化

占位的有力工具。美国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对外援助法》以及“富布赖特计划”“国际访问者”“和平志愿者”等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将美国英语推广到全球；伴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和国力衰退，法国忧虑于英-美语长驱直入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冲击，因而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推动包括法兰西学院、法语联盟等语言与教育组织积极开展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文化外交。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抢滩语言势力范围的行动见证了语言与教育输出在全球文化博弈中的重要性。目前，英国文化委员会拥有230家海外分支机构、138家教学中心，法国法语联盟则在13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140个法语联盟分部，德国歌德学院在76个国家设立了128所分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在23个国家设立38所分院。不仅如此，语言因素还是当今世界诸多区域性组织创设的重要动因。自1986年“法语国家高峰会议”成立以来，“荷语会谈”“西班牙语国家高峰会议”“突厥语国家高峰会议”“葡语联盟”纷纷创设。尽管这些跨国语言区域有着复杂的创设动因，但其显著的特征是对语言工具属性的跨区域运用。

然而，就一国的全球文化竞争力建设而言，作为工具的语言又显然具有局限性。现代语言学揭示，语言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即特定的语言并不总是跟特定的文化相对应。”正是出于对此的认识，“输出什么”的论争一直伴随着孔子学院发展的十年。早在孔子学院成立之初，季羨林先生就提出“中国孔子学院的建立，不要只学语言。”王岳川也指出，“现有的孔子学院作为国外的中文学校，更注重语言教学，有些忽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如果仅仅是在外国教汉语，意义就太狭隘了。”李宇明则从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角度历史地审视了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指出：“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并呼吁“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应该说，上述针对孔子学院阶段性特征的体认预示了转型发展的方向，那就是接下来要转变到以汉语为根基，以文化介绍为主的阶段。当然，转型期内涵式

发展的种种行动表明孔子学院总部充分注意到了“语言”作为文化的有限性，在其修订版《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国外汉语教学“五级目标和内容”的每一部分都明确了“文化意识”的培养目标，并对其实现途径以“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等子系统加以规范，并通过《汉语教学话题和内容建议表》对包括语言与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与技术、政治历史与地理、价值观念等13个子项目的统筹，将“大文化”观贯彻于国外汉语教学之中，而这正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需要更加注重的内容。

超越“语言工具观”导向的文化输出模式有着深刻的国际权力竞争转向的背景。当前，在全球化催生的全球文化博弈中，以本土文化产业为后盾的包括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影视作品、艺术展演等为载体的价值观输出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重要方式。仅就亚洲的日本与韩国而言，固守“语言输出”阵地，抢占“文化输出”制高点的动作，就显示出这一倾向。得益于音像制品方面的文化输出，“韩流经济”2012年首次出现了8550万美元的顺差，其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到1%上升到2011年的5%。鉴于成立于1972年的“国际交流基金”因偏重语言教育在推广日本文化方面的有限性，近年来，日本以建设“文化超级大国”为目标，竭力发展以动漫、电子游戏、时装、饮食、茶道、插花、歌舞伎、日本料理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业。2013年安倍政府又以高于往年10倍的财政投入大力推进“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国际战略”，在全球开设“日本屋”，以进一步增强日本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在这一趋势下，世界各国语言观念和语言政策也正悄悄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这趋势与国际权力竞争互为因果、互为动因，催生了语言教育输出基础上的“大文化”输出模式的勃兴。

文化功能转向意味着要渐次释放孔子学院在“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将其建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这个平台承载着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无论是“文化输出三大战役”（王岳川，2011）、“百千万系列工程”

（洪晓楠，2014），还是“一体两翼”（许嘉璐，2014），都因文化传播的跨国实践，而与以“融进去”为旨归的国外受众战略、传播渠道战略之间存在复杂的纠葛。鉴于此，全面实施、深化拓展《孔子学院章程》的“业务范围”，包括开展以现代传播技术为依托的、“面向社会各界人士”的、本土化的“大文化”输出，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国际教育课题，更是一个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国家话语权建设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课题。

（二）目标受众：从精英到精英与大众的结合与输出内容相适应，目标受众的调整也迫在眉睫。创建初期，孔子学院锁定关键国家和重点群体的精英化路线，适应了全球占位和规模发展的阶段性需求，最大化地激活了有限资源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作为一个难以量化的指标，相关数据和国外媒体报道及民间的态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孔子学院精英路线取得的全球影响力。陈静的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球汉语学习者达1亿多人，汉语被40多个国家纳入本国的国民教育。英国政府要求所有中学在2015年之前开设汉语课。仿照法国，泰国制定的外语教学计划将汉语作为全国中小学的必修课。在美国，汉语已成为第三外语。近年来，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战略在国外精英阶层中引发的“中国文化霸权”论则间接折射出十年规模化发展产生的全球影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担忧颇具“威胁论”色彩，他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必将导致西方文明的终结，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得不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进行重组，并最终形成“中国文化霸权”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格局。关于国外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态度的实证分析则揭示了国外精英的矛盾心态。刘毅研究了《纽约时报》十年来涉及孔子学院的报道后发现，持消极倾向的报道最多（35.3%），其次为中立性报道（31.4%）和积极性报道（27.5%）。数据表明，尽管消极报道最多，但并未形成一边倒的批评态度。这种矛盾心态在两年前《孔子学院的海外镜像——基于国外媒体报道而对孔子学院运作情况的考察》（林雪，2012）中也得到证实。相关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学院十年发展在国外精英群体中产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转型时期，孔子学院面临新的内外部发展环

境。首先，各国文化权力竞争手段更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跨国教育、文化交流和艺术展演等方式之外，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网络外交已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新手段。这些具有大众传播特征的文化输出方式，必然带动文化传播受众由精英向大众的扩散。其次，汉学大众化的内外部条件基本成熟。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基本完成，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指导性”与“专门性”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从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建设和孔子学院自身建设来看。我国已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文化交流与合作协定，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计划；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文化交流合作关系。良好的对外文化关系为孔子学院开展国际文化传播提供了外部条件。近年来，孔子学院管理机构日益完善、建设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的提速，适应了“大数据时代”海外汉学大众化的需要。

办学路线转向“精英与大众”，意味着孔子学院在继续关注国外精英群体的同时，更加关注国外大众群体。关注精英群体是因为这个群体在一国观点、态度的形成中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现实中，“意见领袖”往往是指政府、社团的负责人、领袖、报刊主编、评论家、学者、教育家等各类社会名流，他们掌握着各个国家的话语主导权，对所在国形成对中国的观点、态度和评价起到引导和主导作用。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就明确了“关键区域的政府和人民”作为文化输出的重中之重。然而，网络时代的民众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当下Web2.0技术在全球的普及，推特、微博、脸谱等社交网络平台大量涌现，将公共空间从现实世界延伸至虚拟世界，这一趋势对各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克林顿政府就强调要用21世纪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并直言“直接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联系正是21世纪的外交核心。”奥巴马

政府更是积极倡导利用所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对外交流，称其为“21世纪的治国方略”。他认为，21世纪的外交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而成为政府之间、人民之间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交流。可见，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大众文化发展较为充分的西方国家，民间话语并未完全淹没于主流声音。因此，在关注“意见领袖”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国外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将其作为汉学大众化时期的国外民众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华文化“融进去”的“草根”，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民间基础，是网络外交时代中国文化国际运作能力的关键。

### （三）渠道建设：从小众化到大众化

依托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语言与教育输出，以特定范围内的特定群体为受众，具有明显的“小众化”特点；就孔子学院目前开辟的汉语桥、夏令营、参观旅游、留学生计划/项目、节庆活动等特色渠道而言，也显然带有零散化的不足。转型时期孔子学院的重新布局，需要重组各种文化传播渠道，实现全媒体覆盖。这就意味着在继续重视传统渠道建设的同时，特别要及时跟踪大众传播技术前沿，充分发挥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兼容了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功能和媒介内容的大众传媒在功能整合和内容整合中的作用。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国际传播环境，3G技术使电视传播与网络传播几乎实现了无缝对接，“台网融通”为传统电视开辟了一个多元化的传播新渠道；WiFi的全球应用及4G网络的渐次推广，正在推动“媒介融合”走向深入。

适应网络时代国际文化权力竞争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拓进的步伐，西方国家纷纷转向网络阵地。近年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屡次强调，网络是美国海外宣传的最重要阵地，美国将争夺网络空间主导权。美国还曾利用YouTube、Twitter等网站创意成功策划了诸如“全球民主短片竞赛”“全球Twitter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旨在通过网络新媒体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的参与，在全球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2009年奥巴马就职后的首次访华策划的“博客吹风会”，也是美国拓展新媒体传播的成功案例。如今，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展国际文化传

播，已成为继续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信息项目、意识形态较量之后新的文化输出形式，成为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补充手段。它以国外普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作为受众，成为了解、告知、接触和说服国外大众的重要媒体。此外，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3月公布的旨在指引欧洲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面向教育的“流动的青年计划”和面向数字社会的“欧洲数字化议程”。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大国”的目标后，于1996年公布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2014年推出了“酷日本战略”，都将其国际战略与互联网发展结合起来。时至网络时代，从语言与教育输出到各类文化产品，包括影视作品、报刊、广告、广播等纷纷触网，给目标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在现实层面上，以打造“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为目标的大众化传播渠道建设，需要结合目标国网络建设的实际，综合考虑以下操作路径。首先是如何与所在国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借船出海”的目的。在这方面，我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制作播出《美丽的中国》《敦煌》等纪录片的实践具有典范意义。其次是如何与所在国有影响力的营销渠道联合，以开辟网络建设、远程教育、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展等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综合文化传播渠道。再次是如何与所在国网站合作，以实现现有文献资料数字化，并提供这些历史材料的永久性访问权。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刚刚起步，线下资源的线上整合仍是未来“综合文化交流平台”建设的需要破解的难题。最后，大众传播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关注国外大众的“期待视野”，在把握国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方面，邀请国外专家参与节目制作和栏目策划不失为“内容中国化、形式本土化”的良策。

### 三、转型发展：给我们带来什么

转型发展为孔子学院提出的新课题，无论是输出内容的“大文化”、目标受众的精英与大众的结合，还是渠道建设对大众传播的诉求，都因教育、文化、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缠绕而变得极其复杂。如果把“孔子学院”比作即将驶向远方的“文化航母”，那么在起航前，我们需要

审慎分析：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将展现怎样的文化图景？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复杂的问题整体上归结为“输出什么”和“怎样输出”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而这艘文化航母所能够展现的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面貌也将更加清晰和明朗。

#### （一）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

“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当代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引发的中国文化影响力变化的概念。前者指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影响力式微的现象，后者则是一种相反的文化运动。历史地审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不难发现，那些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圈拥趸者。

明治维新前后，有两种教育体系并存于日本：寺子屋和汉学塾，两者都以中国经典作品研习作为教学内容，是日本教育史上中国文化最受尊崇的时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再加上甲午海战滋生的民族主义，汉学遭受空前冷遇。二战后，日本“脱亚入美”，日本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采取“对内实行单语制”“对外奉行实用主义”，汉语教学被完全排除在日本中小学的全部阶段。尽管汉语教学在二战后日本大学中开始实施，但仍是“第二外语”，且受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影响较大。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1945—1965年的20年间，朝鲜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中国化”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从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消灭汉字”，禁止在课堂和学校教科书中使用汉字。可见，朝鲜的“去中国化”运动深受美国的影响。1945年后，韩国把学习、使用和精通朝鲜语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再加上朝鲜战争后，东北亚军事对抗的存在，韩国国内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运动，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的国家（76.5%），加上长期的英国殖民历史，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和种族问题是这个殖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其中英语和汉语的角逐在1950年后导致华文学校的衰落和英文学校的繁荣，开始了近代新加坡“去中国化”的漫长历史。作为汉语国际推广的重镇，东南亚各国的汉语教育也大致经历了二战后受挫的历史命运。据有关数据，

1937年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8.6万余人，缅甸在日本占领前的1942年华人学校达300多所，1941年菲律宾的华校126所，在校生达2.1万余人。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其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印尼的汉语教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泰国于1957年下令禁止一切汉语教学，缅甸于1966年将华文学校收归国有，柬埔寨在1970年封闭所有华校。应该说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兴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伴随着近现代中国国力衰微导致的文化影响力下降是其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累积效应，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是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股“再中国化”的浪潮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逐渐兴起。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文化战略的深入发展所推动的“再中国化”浪潮也初见端倪。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共同的儒家文化观，近年来，韩国国内掀起了被称为“汉风”的“再中国化”浪潮。2004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目前韩国每天新出版10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专门播放中国节目的HAOTV、CHINATV和中华TV等电视台大量涌现。据统计，韩国120所大学均设有中文系，每年的中文专业毕业生约有3000多人。在世界各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11万人中，其中7万名考生是韩国人。在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至今，出现了两次“汉学热”，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次是新世纪以来。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日本783所大学中开设公共汉语课的大学约700所，选修汉语的学生约16万人。目前，日本是学习汉语人数最多的国家。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纷纷将汉语教育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即便是在未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汉语教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随着国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汉语的经济性日益凸显，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必将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刺激中国文化的复兴。

## （二）从“研究中国”到“中国研究”

姑且将“研究中国”与“中国研究”看作两种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这两种模式因研

究立场、主客定位、研究取向等的差异而易于导致对“中国性”建构的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研究中国”是一个以“他者”立场和视角、以“中国”为研究客体的话语方式，带有鲜明的赛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色彩，即西方在研究非西方世界时，以一种“地位优越”的姿态将非西方根据自己的立场设定为落后的“他者”。如果说“研究中国”形成了西方观察中国社会的一种方式 and 传统，那么这种方式和传统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显然不在于是否有中国学者加入这一论域，也不可能在于其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而在于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假设与西方经验的逻辑基础，注定这一传统或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有效性悬置。长期以来，西方都以一种封闭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错误地再现中国情境以巩固自我。新近，美国学者丹尼尔·F·武科维奇在其所著的《中国与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2012年）中，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展开了审慎的观察，并以“汉学东方主义”的概念描述了“东方主义”的新形态。在“汉学东方主义”看来，“中国处于迟疑不决但不可避免地与我们西方变得相同的进程中：即变得开放、开明、现代、自由。换言之，‘中国’被认为正在变得总体上与西方等同。”这里，武科维奇所要揭示的“汉学东方主义”的核心在于，将过去和当前的中国看做与理性、自由、民主的西方相对立的存在。显然，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到武科维奇所揭露的“汉学东方主义”，一以贯之的话语方式主导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关注的并非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变迁，而是其预设的优势地位，“中国观察者（或专家）的地位优越性，致使中国或有关中国的事情决不能通过挑战广为接受的思想范畴来获取优势地位。”显然，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中国已成为不同于西方的、与理论逻辑不相适应的“悖论社会”。

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建设应对“研究中国”保持警惕，同时，大力推进“中国研究”，真正确立中国学术文化的自主性，避免读着“洋书”了解中国的情景。鉴于此，“中国研究”是以自我立场对自我的全新审视和把握，是一个话语自觉与自决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确立的表征。从“研究中国”向“中国研究”的转向，意味着从被动言说到主动



言说和话语输出的转型，这正是“中国研究”的精神主旨。在这种知识生产策略之下，政府规划和国内学界的努力不可或缺。把学术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构成纳入政府规划在当前尤为必要和重要，学术走出去能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学界的努力应坚持中国主位的立场，既以理论对话又以增进国际社会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简言之，“中国研究”旨在确立大国的话语生产方式。

当然，“中国研究”还要正视一个庞大的海外军团及作为后备力量的青年学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国外共有中国研究机构185家，知名汉学学者1570多人，且主要集中在美、日、德、意、英、韩等国家，这些机构和人员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第一接受者，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但由于缺乏中国作为主体的问题意识，这些机构和人员在海外强大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下，很可能难以超越既定的预设和框架，其所谓中国研究很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向国内的延伸，很容易沦为“冷淡的冷战斗士”“过于自信的道德家”（傅高义，2004）。因此，在现实的意义上，增进这个群体特别是青年学者对作为客体的中国的直接接触，无疑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考量。某种程度上，本土知识背景使他们成为“中国声音”的国际代言人，并且形成一股强力影响西方学界全面分析、阐释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有生力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2013年“新孔子学院计划”的实施无疑是对国外“中国研究”的积极回应，它对中国声音的传播也终将在孔子学院未来发展中渐次深化。

### （三）从“走出去”到“融进去”

在现实的层面上，文化走出去只是一国文化战略的手段，融进去继而实现文化占位、外交支持和理念博弈才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权力竞争的目标。人类文明交流史表明，文化输出的背后其实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即“世界之争表象在‘利益’、在‘势力’，而本质则在‘思想’、在‘文化’。”因此，一种文化要“融进去”才能深入异质文明的内部神经。

然而，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教育

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思想价值观传播的最大特点是潜移默化的、非显著性的，而它一旦确立起在异文化领域的地位，其影响又将是持久的、稳定的。美国著名的国际文化交流专家伦纳德·R·沙斯曼曾总结道，“文化交流，然后政治变化，是经过很多年在这些国家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我们无法弄清楚文化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我们深信它是其中一个因素”。中国文化融进去还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西方近500年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而且这一运动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在延续扩散。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压力，也是最大的外部动力：遭致外来文化“主导”和“殖民”的巨大威胁，换句话说，融进去面临重重困难。就文化市场占位而言，尽管通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基本扭转了文化贸易的逆差，但对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突破、创新和超越仍将在一定时期内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智慧。

当然，“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一个必然结果，它取决于国际权力竞争转型的实现和中国软实力输出的国家战略。21世纪以来，世界重心的东移和全球实力向新兴国家倾斜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国际权力竞争从硬实力向软实力地转型，倒逼式地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舆论的前沿。从理论上讲，任何既定的文化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累积效应，在为中国话语输出提供全方位的强大支撑的同时，也为在“异文化”间传播中国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历史终结”“文明冲突”“文化霸权”，非传统安全以及“软实力”等后冷战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并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新面貌的今天，孔子学院不仅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软着陆的举措，更是向世界发出的和平实现“权力转移”的信号，而依靠自身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融进去，正是当年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关键，“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融进去的判断，而会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总之，全球化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语言观和国家的语言政策，各国都在“全球—区域”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借助语言文化的传播开展文化全球

# 中国大学国际化的一个全球试验

## ——孔子学院十年之路的模式、经验与政策前瞻

李 军 田小红

### 一、引言：大学国际化

从2003年起，中国已经成为拥有全球最大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大学的国际化程度与日俱增。2013年来自200个国家的356499名学生在中国接受留学教育，人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大学的崛起已被广泛期待为世界文明对话中积极有益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大学开始真正走出国门，并开展实质性的、全球性的国际化合作。这一全球性实验的标志，便是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迅猛创立和发展。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4日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运作。截至2014年10月底，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以下简称“汉办”）已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1所孔子学院和730个孔子课堂，向全球派出了上万名教师和志愿者。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以及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历史上，孔子学院的国际教育合作规模均属空前。与此同时，孔子学院的创立和发展标志了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走向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中国大学3.0。

从十年前的创办开始，孔子学院就引起国内

和国际的广泛关注。除去技术层面的语言教学和大众文化传播之外，关注的焦点是它在教育、合作以及发展等领域的国际作用。本研究在广泛调研全球6大洲15个国家27所孔子学院的个案基础上（见表1），旨在以实证数据回答下述三个广为关注的问题：第一，孔子学院有哪些基本的国际化合作模式、经验和挑战？第二，孔子学院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有何不同？第三，孔子学院在中国大学国际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中又究竟有何意义？

表1 孔子学院6大洲15国取样分布表

序号	洲	国家/地区数量	孔子学院数量
1	亚洲	4	10
2	欧洲	2	2
3	非洲	5	8
4	南、北美洲	3	4
5	大洋洲	1	3
总计	6	15	27

化进程中的抗衡或守成。在当前全球化的话语脉络中，“中国”或“汉语”作为一个图像、一个指意符号的重要性多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标签。自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宏大叙事”的最大抗衡力量。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抗衡并非必然是一种有政治目的的对抗行为，也不一定是对另一种文化的简单否定或排除，它是一种含混的效应，是在支配性论述的确认规则中勾画出文化差异的符号。从“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上看，中国的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文化输出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教育的阶段，其转型发展必然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定位、延伸自我指涉的空间，在输出内容、目标受众、渠道

建设等方面适应国际权力竞争转型的需要。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和动态的过程，孔子学院只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一个日益茁壮的品牌而非全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为此，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用好语言教育、文化传播、文化贸易三种方式，着力建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

（杨文艺，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安徽宿州 23400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4期）

## 二、本研究的比较案例法

孔子学院分布全球，涉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多种多样，是在与不同的社会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交流与合作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研究者无法进行情境预设或者对研究对象实施干预。较为恰当的选择是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范式来进行研究设计，避免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与此相应，本研究倚重于现场观察、研究者参与和关键人员的访谈等渠道了解相关者的特性及其关系结构、行动和互动过程，以期对孔子学院运行的实际状况和特点进行多元化的理解和具有社会背景性的解释。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本研究设计了比较案例法，从亚洲、欧洲、美洲（南、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理论抽样并选取案例，进行实地访问和观察，通过多种渠道完成数据收集，然后再把所有数据进行汇总和交叉分析。自2010年以来，课题组成员分别前往6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27所孔子学院开展了全球性的实地调研工作，足迹遍布非洲（东非、北非、西非、南非）、北美洲、南美洲、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和大洋洲，并全程参加了2013年12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和2014年6月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访谈的对象包括孔子学院的中外方大学校长、院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以及相关学者6类人员共逾百人次。所有录音数据都转成了文本数据，并结合现场笔录数据进行了编码分析。一级编码包含了几个关键变量和相应的分析子单位，二级编码则采用了Bogdan和Biklen的十个编码类别。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创建了关于孔子学院研究的全球最大型的独立数据库。

本研究严格恪守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伦理规范，所有案例孔子学院、现场访谈和观察均基于参加者的知情与志愿。访谈的过程综合运用了非正式访谈、访谈导入及标准化的开放式访谈三种策略。此外，本研究收集的文件、各孔子学院官方资料、汉办的官方资料、会议材料、年度报表等被用以进行数据的三角互证，并由部分参加者进行内容核实。

## 三、初步的发现

### （一）国际需求的多元性

中国政府建立孔子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全球范围内日渐高涨的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需要，是一种“需求—供给”模式。那么，外国的大学为什么愿意与中国大学合作设立孔子学院？研究发现，外方大学申办和运作孔子学院的动因具有多重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多重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中外双方在此过程中是相互获益的。

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是孔子学院创立和发展最主要的动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中国进行甚至扩大经贸往来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兴趣与利益。这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地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现实需要——无论是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印度、阿根廷和菲律宾，还是瑞士、英国、土耳其、埃及、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喀麦隆等均有同样的需求。同时，这也与中国政府创办孔子学院的初衷与预期十分吻合。

开展、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教育合作是孔子学院创立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动因。许多因孔子学院结对的中外大学在历史上就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通过孔子学院的常规化运作，两校之间的交流更加组织化和常态化，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北京的教育合作。一些原来与中国没有建立联系的国外大学也通过孔子学院开展了与中国大学的教育合作，如坦桑尼亚的多多马大学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教育合作。这些通过孔子学院的教育合作甚至帮助各国的大学新开设、增设或强化了他们的汉语教育系科或专业。与此同时，这些教育领域的合作也使中国的大学变得更为开放和具有全球视野。很明显的是，中外合作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并形成双赢的局面。

再一个重要的国际动因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需求。这虽然常常表现在国外大学对中国外交的个别需求，但是实际上因此形成了一种广泛的需求而变成了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外交需求。如我们观察到很多主办大学希望借助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加深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或者是利用孔子学院进一步了解中国。相对而言，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功能倒是略显次要。在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

传播均非常有实力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孔子学院并非以汉语教学或中国文化传播为唯一的重心。许多孔子学院甚至还肩负向本地学生介绍前往中国留学的任务。尤其是对那些希望拿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学生而言，孔子学院甚至起到一个准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外交作用。孔子学院还成为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访问巴西的重要外交内容。习主席和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共同见证了巴西塞阿拉联邦大学校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校长、帕拉联邦大学校长与汉办主任许琳签署设立孔子学院的签字仪式，使巴西的孔子学院从原来的7所增加至10所。如此种种，都使得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

## （二）功能与服务模式

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但每一所孔子学院因其主办大学的自身条件和特点、当地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汉语教学资源不同，其服务方式和运作模式都有所不同。从这一点可以说，每所孔子学院及其运作都是独一无二的。总体说来，孔子学院可以大致分为以下4类服务模式。

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教学主导型，是最主要的功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体现。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孔子学院、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加拿大温哥华的BCIT大学孔子学院，都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导的。再如菲律宾红溪礼士大学孔子学院、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印度韦洛尔科技大学孔子学院等等，也都把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作为首要服务内容。教学主导型的孔子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主办大学的汉语教学及其课程设置的诸多方面，成为主办大学的有机组成。

第二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是社区服务型，也是较为主要的一个功能，体现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汉语教学基础好的地区。鉴于本地媒体对孔子

学院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孔子学院便将自己定位于为社会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服务。菲律宾马尼拉的雅典耀大学是该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汉语教学的历史比较长，其孔子学院的定位也在社区服务上。肯尼亚莫伊大学与上海东华大学最新成立的孔子学院被置于大学的纺织产学研区。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的孔子学院积极参与本地社区活动，如葡萄酒节、国际美食节、当地的青年节等。孔子学院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融入当地的文化之中，从而促进多方的互相了解。这种社区服务型的孔子学院也大多提供HSK考试、汉语桥比赛、孔子新汉学计划、留学中国及奖学金项目等服务，是主办大学与中国配对大学之间交流的常规化平台，并成为面向本地服务、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促进了解中国的社区中心。

第三种模式可以称之为学术研究型，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一所著名私立大学，其汉语系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汉语教材和师资都相对完善。其与北京大学合作的孔子学院如果仍致力于推广汉语教学的话，会和原有的汉学教学师资形成不良竞争，不利于发展。有鉴于此，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便定位于学术研究，尤其是汉学、东方学及全球化等领域。同时还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甚至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同样是在发达国家，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所在地是世界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地，保守和开放并存，因而其孔子学院定位于中国和瑞士乃至欧洲文化交流与比较的学术平台，除了常规的中国文化活动之外，还开展联合世界知名大学的学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四种模式可以称之为融入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发展。日本东京樱美林大学和爱知大学的孔子学院除定位于在本地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平台之外，都把汉语教学变成正规的本科生学分课程。也就是说，其孔子学院已经融入大学课程的正式系统，变成学校的正规教学单位。当然，教学质量方面就会有更为严格的常规监测和控制。再如，与西北大学合作的菲律宾布拉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和与吉林大学配对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孔子学院也与此相类似。

调查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办大学没有汉语系，汉语师资、教材、课程体系等都是一片空

白,孔子学院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汉语系的主办大学,希望借助孔子学院的力量和品牌,扩大汉语教学服务和增强机构在汉语教学方面的市场竞争力。但是,是否申办孔子学院与主办大学管理层对大学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关。学习汉语需求不一定能够直接转化为大学申办孔子学院的直接行动,主办大学对中国持续崛起的预见、对与中国政府和大学的关系的重视是做出决策的一些重要动因。在这种情况下,主办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对孔子学院发展的远见、开阔容纳的胸怀和持续的支持对孔子学院的设置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上述四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在访问中发现,各地孔子学院根据各自的情形不断调整服务方式和重点,上述四种模式也有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所孔子学院。如与上海大学合作的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既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学分课程,也积极融入当地的社区文化,并与该校亚洲研究中心联合进行中土学术研究和交流,举办中国—土耳其高端论坛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四种主要的功能与服务模式外,本研究没有发现孔子学院有从事其他方面的、尤其是推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的活动。换言之,没有实证证据支持所谓的“特洛伊木马”现象发生。总体而言,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推广、学术研究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多样性和互惠性,已经逐步融入世界各国独特的社会土壤之中。

### (三) 国际合作中的运行模式

在运行和管理方面,《孔子学院章程》规定理事会负责孔子学院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实施、院长聘任或解聘等的审议,最后由汉办审批。中方院长、中方教师和志愿者也是在此基础上由汉办派出。在日常事务的管理和运行方面,“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是汉办对孔子学院管理的制度安排,也是各个孔子学院之间的共同特点。由于具体层面的管理和运作是由院长负责,中方院长和外方院长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对具体事务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孔子学院的运作模式。研究发现,孔子学院的合作运行模式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种多样,可以大致划分为汉办主导模式、主办大学主导模式、以及相互协作模式三种。

在汉办主导模式中,中方院长对孔子学院的各项事务具有主导性。外方院长一般是由主办大学的学校或者部门领导兼任,对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务并非真正介入或者参与不多,但在重大事务方面,能够整合资源,对中方院长的决策和举办的活动给予有力支持和配合。这种情况多出现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孔子学院,如分别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的肯尼亚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和与山东师范大学合作的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以及与西北大学配对的菲律宾国立布拉卡大学孔子学院。后者中方院长负责汉语师范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以及中国文化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等,外方院长则是由副校长兼任,难以把时间投入到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务上,但是运用其副校长的职位在需要调集本校相关部门的配合和相关人员的参与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与配合。

主办大学主导模式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知名大学。这些大学一般都声誉卓著,甚至有较好的汉学系,外方院长对孔子学院的项目发展和规划亦有非常清晰的远景意识,在发展规划、项目策划与实施、日常管理等方面能够起到主导作用。这在日内瓦大学、立命馆大学、开罗大学、悉尼大学等的孔子学院体现较为明显。在这些大学中,外方院长或项目主管起了主导性的作用,而中方院长则相应地起到配合、协调及具体教学的作用。

在相互协作模式中,中方院长和外方院长在合作分工的基础上,共同商量、决定孔子学院的院务和发展。这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模式,如菲律宾的红溪礼士大学孔子学院、雅典耀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等等。

### (四) 财政模式

《孔子学院章程》规定“中方投入一定数额的启动经费。年度项目经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1:1左右”。这使得孔子学院的财政投入主要是由汉办和主办大学共同分担。主办大学必须满足设置孔子学院所需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等方面的要求。不过,孔子学院在经费投入方面,各个孔子学院之间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存在差异,由此而产生的财政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平等分担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汉

办投入初期启动经费十万美元，财政预算由汉办批准，其他开支由汉办和主办机构共同承担。这种模式一般是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办学经费充足的孔子学院中，主办大学能够保证与汉办同等的一比一的经费投入甚至更多。

第二种是依赖汉办型模式。汉办是孔子学院的唯一投资者，孔子学院的其他经费则来源于学费或者赞助。如菲律宾的国立布拉卡大学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所国立大学，学生数量多，学费低，政府投入少，办学经费相对紧张，对孔子学院，学校除了提供必备的场地和人员外，其他方面则没有经费投入，但孔子学院由于承担了本科生的学分课程，因此有部分的学费收入。

第三种是依赖主办大学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主办大学是唯一的注资方，并未接受汉办的经费投入。如日本爱知大学的孔子学院是在原有的开放学院里面挂牌成立的，从成立之初就没有向汉办申请过经费。成立之后其课程、教学安排和师资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延续，只是增加了一位中方院长参与到教学中。另一种情形是汉办有经费投入，但主办大学却没有使用汉办投入的资金。如汉办虽然给立命馆大学的孔子学院每年划拨了一定的经费，但却并未被使用。因此，它是一种在财政上自主运作的方式，只不过是汉办授权使用孔子学院的名号而已。

#### （五）主要挑战

十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虽然极为迅速，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一个挑战来自中西方大学传统理念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中外方大学合作的可持续性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挑战来自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这在孔子学院整体上和个体上都是至关生存的重大问题。这一挑战与中外方大学之间的合作是否通畅，以及中外方院长的工作能力和模式直接相关。在这一点上中外方孔子学院的院长角色至关重要。有些中方的孔子学院院长本身对所赴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了解和掌握有限，有些外方院长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掌握也甚类似，甚至只是挂名而已。这些局限都会极大地影响双方合作的顺畅性和对等性，并最终影响该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相关的再一个挑战是如何融入当地、因地

制宜。如在针对并适合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条件下选拔和使用教师和教材。另外，汉办对各国中方院长和教师的支持上需要有更多战略性的平衡，尤其是对前往欠发达国家孔子学院工作的中方院长和教师，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关爱。

再次，是孔子学院如何更好地担当起国际社会文明使者的角色。正如李源潮副主席在2014年6月24日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孔子学院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传播中国文化和学习世界其他文明是孔子学院的双重任务，也是它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如果说每一位外派中方人员都是一张中国名片的话，这些名片自身能体现出什么样的中国文化特点、他们又能学习什么样的异国文化就至关重要。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派遣前加强对中方孔子学院院长和教师对有关派赴国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培训，培养他们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习惯，并在派遣后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融入异国他乡的社区生活。正是他们对各国本土文化的渗入式了解和学习，才能真正促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切理解。

最后，孔子学院在短期内的迅猛发展对自我科学评估和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虽然已有来自第一线的实践者对孔子学院的多方位研究，但是在研究方法、领域、理论和视野等诸多方面多数局限于汉语教学或文化传播等技术性层面的泛论，难以为孔子学院的自身发展以及国际性的教育发展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服务，也不能提供具备国际水准的科学研究成果，几乎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并对之产生影响。对于孔子学院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高水平的政策研发中心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优先战略。

正如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那样，孔子学院现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都是十分正常的，是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如何看待和如何处理，却需要超乎寻常的智慧、策略和眼界。

#### 四、政策启示与前瞻

作为中国大学国际化进程中的全球性试验田，孔子学院在短短十年中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办学质量来说，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迅猛发展。本研究根据

扎根理论和独立的数据库，揭示了孔子学院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可以为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规划、国际教育合作、世界文明的发展等方面提供有益的政策反思和启示。

（一）全球性的刚性需求是孔子学院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

孔子学院十年的发展经验首先应当归功于汉语和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强大吸引力，这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的产物。如前文所述，对孔子学院的全球性需求并非由中国政府或汉办所决定。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世界性需求是刚性的，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在各国或地区的主办大学。发达国家重视把孔子学院建成为与中国配对大学之间沟通、交换和组织的组织化平台，发展中国家则更倾向于把孔子学院看作是扩大该机构在本地、中国和全球影响的机会，诚如某发展中国家的中方孔子学院院长所说的那样：他们这个学校在X国是很没有名的一个学校，他们觉得他们办了全国仅有几所孔院中的一所，他们经常给别人说，现在只有三个孔院，我们就是其中一个。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可以自豪的一个东西。

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来说，孔子学院并非是中国强加于或诱惑他们的东西。相反，它是各国大学基于各自院校发展、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自主选择，是在主办大学的控制之下借用中国政府的力量促进该地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学习，加强与中国大学之间交往的教育文化机构。

（二）孔子学院十年的发展得益于各国大学之间的国际合作

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以及日本基金等世界其他文化推广机构不同的是，孔子学院基于各国和地区主办大学的自主选择，以及他们与中方配对大学的制度性合作与努力。因为并非主要源自政治或经济的利益，孔子学院的创立和发展是基于世界各国大学自身的院校兴趣或策略，同时还必须依赖于中外双方大学的相互合作才能得以生存和壮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学院不仅仅在全球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它也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加速了中国大学的国际化进程，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制度化的宝贵平台。在这一国际合作的关系中，中外合作

双方的平等性和互惠性是基本的原则和特征。

就本质而言，孔子学院是一种教育领域的、多元化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平等合作的模式所衍生的政策启示并非仅限于大学机构本身以及对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的影响。它具有很广泛的国际推广价值。如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教育与发展领域等诸多合作领域，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孔子学院在全球发展的重要特色是中国性、本土化、多样性和全方位

孔子学院肩负传播汉语和中华文明的根本宗旨，各国的孔子学院也因此呈现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中国性，体现在孔子学院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如孔子学院是各国大学校园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一个场所，甚至从外观上就能一眼识别出来。在调研中体会到，在孔子学院进行交流的时候也常常不需要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即便是和外方院长或者学员进行谈话。这本身已经体现了孔子学院的成功之处。

与中国性同样重要的一个基本特色则是本土化。在全球性的调研中观察到，各大洲、各国、各校的孔子学院大都已经完成本土化的过程，在办学模式、合作平台、招收学员、课程设置、汉语教材、乃至场所和工作的重心等方面，都结合了各地各校的本地情形开展，并因此赢得当地学员的认同、信任和欢迎。就办学特色而言，各地的孔子学院服务于当地也是多样式的。如在汉语教学方面，课程的程度与教学方式不仅包括正式的学位课程，也有服务于社区的非正规、非正式的学习或文化项目，以及为工商企业专门性语言和文化培训的短训班，以更多形式满足了世界各地学员不同的学习和交流需要。

除了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两大主要功能之外，孔子学院的功能还是全方位的。如在东南亚、非洲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孔子学院有时具有准大使馆的作用，在鼓励各国有志学习汉语或中国文化的人士（尤其是青年）来华留学，或者为从事各种与中国相关业务的人事提供信息和搭建交流平台。同时，有的孔子学院在促进当地科技园区或工商企业园区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等场合，也积极发挥特长。此外，孔子学院还为中国的大学了解国外大学体制、进行更多人员往来和合作、乃至体察他国社

# 全球视野下的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

——为纪念中国孔子学院创办十周年而作

吴勇毅

十年斗转星移，春华秋实，在“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是件大好事”的助推下，国际汉语教育着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学院的建设也给汉语及中华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口，构筑了一个平台。但这是一个双向的平台，它同时也为世界了解华夏搭起了一座语言沟通、文化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说，孔子学院是在各种争议中前进，在中外文化的会风土人情等等，提供一个常规性的学习窗口和交流渠道。

## 五、结论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教育合作和中国大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化项目，孔子学院从创建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十年。这个十年充满了探索与挑战，在经历了一个年代的成长后，这个转变仍将是一条国际合作的探索之路，无疑会给教育与发展这一人类重大主题、尤其是大学之间的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的开创性经验。

本研究无意于评价孔子学院的十年经验成功与否，在全球所选取的27个研究案例因种种限制，在抽样上未必具有普遍代表性，也未能更多地访谈汉办及各合作大学的相关官员。但仅就本研究的发现而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各展个性，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经验或挑战。虽然它们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但是在创办的动因、功能、服务模式、运作模式的合作中，乃至财政模式和主要挑战等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得以放大化和显著化。正是这种差异化的多元发展才丰富、立体地体现了在教育与发展主题下国际合作所必须的经验多样性，为在各国复杂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和教育发展，甚至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孔子学院的十年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在全球推

碰撞与交融中发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若能以各人不同的观察视角去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形成策略，无疑将有助于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学科的进步。

## 一、国际汉语教育的重要发展与变化

孔子学院的宗旨和使命是“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孔子学院的发展站在了一个与世界其他文化推广机构完全迥异的出发点。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学院是促进世界文明间交流和对话的和平使者。她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学间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广泛、常态和组织化的机会和空间，是中国大学3.0真正走向国际化的标志，并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通过教育领域的空前国际合作与发展，孔子学院让世界对中国不再陌生，也让中国对世界更加熟悉，并让地球村的明天可以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在2014年6月24日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大会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希望孔子学院的文化桥梁作用应该是双向多元的——“既传播中华文化，又弘扬非洲文化，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可见，孔子学院的发展站在了一个与世界其他文化推广机构完全迥异的出发点。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学院是促进世界文明间交流和对话的和平使者。她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学间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广泛、常态和组织化的机会和空间，是中国大学3.0真正走向国际化的标志，并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通过教育领域的空前国际合作与发展，孔子学院让世界对中国不再陌生，也让中国对世界更加熟悉，并让地球村的明天可以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李军，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副教授、香港教育研究学会会长，香港沙田N.T.；田小红，浙江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浙江金华 32100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4期）



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孔子学院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汉语国际推广或汉语国际传播是国家的事业，也是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之一，作为一项事业，在孔子学院建设的有力推动下，国际汉语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国内、国外两个方面。从国外来看，随着孔子学院的增加和助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在较大幅度的增加（尽管有人对数字统计来源存有异议），这是不争的事实。透过学习汉语人数增加的现象，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学习汉语的中小學生，也就是说少年儿童增加了；二是汉语教学正在逐步走进所在国的国民教育体制（许多孔子学院都在帮助当地中小学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活动），成为体制内的外语教学科目，在美国甚至出现了“汉语沉浸式”（只说汉语）的幼儿园和小学。据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查白乐桑先生介绍，在法国的基础教育中，汉语科目属于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十几年前，全法只有14个学区在基础教育中有汉语教学，到2014年已增至29个学区，覆盖了法国本土全境和一部分海外省；有618所初中、高中开设汉语课，近40000中学生学习汉语。白乐桑先生是用“汉语教学的崛起”来形容这种情势的。

2013年应毛里求斯共和国教育部的邀请，受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委派，以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吴勇毅教授为组长，方欣欣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丁安琪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为组员的三人评估工作组于10月7日至14日赴毛里求斯对该国的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进行考察与评估。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外国政府主动提出邀请，要求中国专家对其基础教育中的汉语教学进行评估并提出发展方略，具有历史意义。期间，评估工作组围绕着教学、教师、教材、考试、督学、课程、志愿者等问题与该国教育部、大学、中小学、考试中心等多个单位进行了沟通，并实地考察了多个中小学（包括随堂听课），与校长、一线教师和学生等进行了座谈。考察结束后，评估工作组向毛里求斯教育部提交了名为“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odern Chinese in 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的长篇评估报告。毛里求斯副总统、教育部长等许多高层领导接见了评估工作组并与之进

行会谈，对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以及毛里求斯的汉语教学表示出高度的重视。

2013年10月下旬，印度中等教育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渴望健全和大力发展印度中等教育中的汉语教学，并希望中国专家赴印度帮助他们制定中等教育的汉语教学大纲。此后不久，由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叶军教授带领的工作组赴印度，完成了大纲的编制任务。

这些事件表明，汉语在世界上正逐步进入所在国的中小學的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学习汉语“从娃娃抓起”对未来汉语能否成为真正的国际性的语言起着重要的作用。恰如白乐桑先生所指出的：“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取决于在多数国家汉语能否融入基础教育主流。”这是国际汉语教育的关键之一，决定着汉语的未来走向。

从国内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使得国际汉语教育这一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事业对学科提出的要求或者说需求，既是对学科的挑战也给学科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赵金铭指出：“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国际汉语教学，再到国际汉语教育，本学科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备，视野更加开阔，范围更加广泛，研究理念更加先进，研究成果更加丰厚’。”

除了教育部在学科目录上把“对外汉语”本科专业改为“汉语国际教育”以外，学科的重要发展之一是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MTCSOL）（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国际汉语教育的实用人才（包括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一些世界范围内汉语师资匮乏的缺口（当然也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比如开设此专业的院校过于迅猛、学生培养质量良莠不齐、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等），这些学生就读期间（也有些在毕业后）大都以志愿者的方式走出国门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目前国内已逐渐形成了“一条龙”的培养体系。比如，华东师范大学于2011年在全国率先自主设置了“国际汉语教育”的二级学科博士点（此后，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也先后自主设置了类似的博士点），

这样从本科阶段的“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专业）到硕士阶段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型硕士）（下设有对外汉语教学方向），再到博士阶段的“国际汉语教育”（自主设置）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设有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学等方向），构建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培养链。事业对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过程中，或者说到现阶段，我们可以注意到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在发展战略和策略上的一些变化。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初期，“六大转变”之一是“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来学习汉语，即使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日常生活汉语；而到了目前的阶段，除了普及，一批“研究型”的孔子学院已经或正在建立起来（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和比利时自由大学就正在探讨合作建立研究型孔子学院）。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孔子学院总部于2012年设立了“新汉学计划（China Study Plan）”，实施“博士生奖学金计划（Fellowships for PhD Program）”，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申请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申请中外合作培养的博士生以及申请专项研究课题资助者提供奖学金；2014年该项目更名为“孔子新汉学计划（Confucius China Studies Program）”，包括“中外合作培养项目”“来华攻读博士学位项目”“‘理解中国’访问学者项目”“青年领袖项目”等6个项目。2014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除了继续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奖学金以外，又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含汉语言本科汉语国际教育方向）奖学金。该专业过去主要是培养中国学生的，现在拓展到了留学生，向亚洲和非洲地区不发达国家有志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孔子学院学员提供资助，以培养这些国家本土汉语教师。这些举措表明，孔子学院总部越来越注重“本土的”“高层次”“人文社科”类专门人才的培养，而孔子学院的平台也从一般汉语教学、中华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的介绍逐渐深入到汉学家的培养，以及帮助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深邃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的理解（比如最近推出的“六艺”

国际传播）。

## 二、孔子学院是开展公共外交的窗口与平台

“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旨在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赵启正指出，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而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

2011年8月笔者在国家开放大学的“国际汉语教育新形势下的教师培养论坛”演讲，题目叫做“公共外交、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的人才培养”（后以“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的公共外交价值”为题发表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笔者提出，孔子学院是开展公共外交的有力平台。当时引起了与会者的一些争论。今天看来，在国家层面上，已经把孔子学院作为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学院不仅要推广和传播汉语及中华文化，也负有开展公共外交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的外派教师和志愿者应该具有一定的、甚至较强的公共外交的意识与能力。这需要在汉语作为二语/外语的教师教育中有意识的培养，包括开设相关课程。作为志愿者教师选拔的主考官，笔者欣喜地发现，2014年的自愿者教师的选拔考试中首次有了关于公共外交的题目（尽管考生回答得并不尽如人意）。

2014年3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践行公共外交），在同他们的座谈中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友善包容地相处。他强调，一些人对中国有偏

见，主要是源于陌生、隔阂和不了解。了解中国，不能只看一个点、一个面，切忌盲人摸象。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就是源于中华文化。孔子学院的宗旨和使命与习主席的讲话精神是完全契合的。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第一章总则第四、第五条），而“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借鉴，也是公共外交的应有之义”。

其实，外国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一直就在开展公共外交的工作。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扬·梅利森明确写道：“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晚期这段期间，美国政府通过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 Information Agency, USIA）培养了大量公共外交专家，而欧洲各国如德国和英国则通过文化机构如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来推行公共外交工作。”目前，“北约和欧盟的公共外交目的在于呈现出他们作为国际行为体和全球规范传播者的整体性。此外，欧盟甚至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提出了一些合作性的公共外交倡议：其中一个叫做‘优尼科方案’（EUNIC Scheme）的力图克服平行的国家方案产生的收益递减现象，旨在推动一些欧洲国家的文化机构如法语联盟、塞万提斯学院、英国文化协会之间的合作”。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它对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它要真正讲好“中国的故事”，展现好中国的国家形象却并非易事。出于各自的理解和目的，关于孔子学院的争议也许还会不断产生。尽管“事出有因”，但我们仍然需要总结孔子学院的办院经验和教训，直面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孔子学院有一个与歌德学院、法语联盟、塞万提斯学院、英国文化委员会完全不同的特点，即后者是由单一国家和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包括经费资助）的，而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的。这一特点使

其具有了其他国家类似机构所没有的优势。在办院上，合作方（外方）是“我要办”，而非中方“要我办”，且合作方（外方）要提供办院场所（中方则从人力、办学等方面提供支持），这种“实体”是其他类似机构所不具备的，这也是一种民主化的体现。从这一点上说，孔子学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降低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也许是不不少人想说的话，但谁又能说国外类似机构没有官方色彩和政府背景呢？我们要检讨的或许是行事的方略。

孔子学院要能够长久地可持续发展，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广泛认同，切实成为公共外交的窗口和平台，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和改进。

首先，要把孔子学院打造成一个双向交流的平台。既然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且主要是与外国的大学、中小学、社会等教育机构合作的，那我们就不能把孔子学院简单地看成是单向的公共外交窗口，只是考虑怎么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别人听，把自己的看法、观点和立场传播给别人，把自己的形象展示给别人看，还要学会“倾听”。“新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更应该对他者‘倾听’，是对话，而不是独角戏，也不仅仅是追求短期政策目标，也要重视长期的关系建设。”倾听的目的是了解对方，既要了解对方对我们的看法和立场，也要了解对方自身，善听才能智行。

其次，孔子学院应该尽量融入到合作方（外方）的体制内。孔子学院是办在外国的，可目前不少孔子学院尽管对外宣称都是某某（外方合作单位）孔子学院，但却游离其外，没有真正融入到外方合作单位的体制内，成为其真正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美国的爱荷华孔子学院（中方合作单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和德国的纽伦堡孔子学院（中方合作单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爱荷华大学孔子学院已经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纽伦堡孔子学院则被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正式承认为该大学的附属学院。融入后，双向的交流互动才真正成为可能，它不仅架构了沟通当地社会和中国“汉语桥”，也可以成为外方合作单位研究中国问题、汉学，乃至东亚研究的园地。

再次，孔子学院的建设要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动态的管理。那些办得不好的，既不能推广和传播汉语及中华文化，又不能很好的起到公共外交平

台作用的孔子学院要逐步淘汰。“准入”只是设门槛、打基石，过程管理才是最重要的，而“淘汰”是品质得到保证的必要措施之一。只有这样孔子学院才能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类似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各种语言和多元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如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平等共存、交流发展已是当今“地球村”村民的共识。新媒体、大数据时代把人们交流与沟通的时空拉得更近了。孔子学院需要与歌德学院、法语联盟、塞万提斯学院、英国文化委员会、韩国世宗学堂等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推进世界语言与文化的繁荣。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潜移默化，滴水穿石。只要我们加强交流，持之以恒，偏见和误解就会消于无形。笔者以为孔子学院的建设亦是如此。

### 三、国际汉语教育的双赢取向

在进行汉语国际传播、从事国际汉语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各个国家愿意开展汉语教学，其动力源，从政策层面上说，主要是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而并非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举例来说，从历史上看，越南是接受汉字和汉文化很早的国家，“自秦始皇派军攻打百越（公元前214年）至公元前207年，赵佗起兵在南海及欧罗两地称霸。在这个时候越南百姓才接触到邻邦的文明，而且只有少部分越南人通过赵佗官吏的策令接触到汉字。东汉末年，士燮占领五岭，兄弟一家治理交趾，并大力向越南传播汉文化……为了同化政策服务，开拓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影响，中国朝廷加强将汉文化、儒家思想、汉字传入越南。与此同时，越南为了独立自主积极地接受汉文化、儒学，特别是‘汉字’这个书写文字。这一吻合使汉字、汉文化顺利地越南传播并发挥影响。”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越南为什么会积极接受汉字和汉文化。

方颖在分析了中美两国的汉语教育政策各自的核心利益后指出，美国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和全球领导力，而中国是为了提升国家实力、创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创建和谐局面。在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上，中国国家汉办正式提出“汉语国际推广”的名称，开始了从对外汉语教学向汉语国际推广的转变；而美国于2006年1月前总统小布什启动了“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联合美国教育部、国务院、外交部和情报局四大联邦部门的力量，大规模推广关键语言，而汉语是其中排名第二的关键语言。这一契合使得汉语教学能够在美国获得较大的发展，因为发展汉语教学同样也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其实，即使在汉语教学发展得非常迅速的东南亚国家，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上看，也都有着各自的利益所在。

既然“传播者”和“接受者”（姑且这样说）在同一事件上有各自的核心利益和目的，那么双赢就是一种最好的取向。吴勇毅指出，汉语国际推广和文化传播不仅能给我们国家带来巨大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利益，包括教育、文化产业、出版、旅游、外贸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而后者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会深刻影响他国政府和公众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际关系的看法。方颖基于SWOT模式，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汉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大规模开展汉语推广项目，能够促进中美贸易的发展，增强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感，拉近中美距离。同时也在美国人心更新神秘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古老形象，重新构建起全新的积极的中国形象。”同时，这也符合美国的人才需求和利益所在。“求同存异”，共享各自的语言财富和资源，这是双方可以合作的基础；通过语言的沟通，增进双方的了解，双赢是可能的。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从根本上说，汉语国际推广或传播的主要推力是来自“接受者”本国，而中国则是外在的强大助力。

（吴勇毅，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

（原文刊载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吴应辉

在2010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孔子学院的标准与评估成为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孔子学院评估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仅见孔子学院总部推出的《孔子学院自我评估办法》（以下简称“自评办法”）和一篇相关论文。自评办法很像一个调查表，通过“自评办法”里的内容，可以了解国外孔子学院办学的大概情况，但没有设定分值体系，很难达到“评估”效果。有学者对孔子学院评估目标与实施主体、评估内容与实施程序、评估模式与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至今尚未见到一份可以付诸实施的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本文探讨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问题，试图建立一套可以直接应用于孔子学院评估实践的指标体系。

## 一、建立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 and 基本原则

项目评估的主要内容是绩效评估，而绩效评估的主要方法有360度考核法、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考核法等。360度考核法，亦称全方位考核法，是指从与被考核对象存在工作关系的各方主体获取被考核者信息，并据此对被考核对象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绩效考核的过程。360度考核法不太适合孔子学院的评估考核，因为孔子学院分布于世界各地，要进行全方位考核，获取数据难度较大。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法是指把最能反映影响考核对象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用于考评指标体系后对考核对象进行考核的方法。所谓关键绩效指标是指衡量孔子学院战略实施效果的关键指标。通过关键绩效指标的考核，可以考察孔子学院的业务重点，传递孔子学院的价值导向，促进各孔子学院绩效的提升，使孔子学院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与360度考核法相比，用关键绩效考核法对孔子学院办学状况进行评估较为适合，因为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多样化特征，我

们只能抓住一些关键驱动因素用于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估。此外，对孔子学院个体的评估目的不仅仅是对过去工作的检查，更重要的是引导孔子学院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而，在孔子学院评估的指标体系建立中，应充分注意选取那些具有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性的关键绩效评估要素。

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评估目的。评估指导思想是，通过评估进一步加强孔子学院总部对国外孔子学院的宏观管理和指导，促使合作各方重视和支持孔子学院建设工作，促进国外孔子学院自觉根据孔子学院章程，结合当地情况，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办学规模，促进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实现孔子学院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孔子学院评估的目的，是引导孔子学院不断改善办学状况，而非简单的办学状况评判。通过评估，要努力实现“以评促建，不断改善”。因此，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 依章评估原则。孔子学院评估应遵循《孔子学院章程》规定的主要原则，指标体系应以《孔子学院章程》为依据，要充分体现《孔子学院章程》的各项要求。

2. 导向性原则。评估指标体系应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充分体现孔子学院总部的办学理念和政策导向，应该引导孔子学院集中力量以开展汉语教学和汉语传播相关工作为主，同时积极推介中国文化。

3. 科学性与系统性原则。评估指标体系应力求科学、系统，各项指标之间权重合理并能充分体现孔子学院的办学规律。同时，应全面反映孔子学院的基本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教学质量、办学规模和经营状况。

4. 非盈利性与可持续发展兼顾原则。孔子学院是非盈利组织，但非盈利机构，并不等于非经营

机构。在经济学和法学文献中，非盈利机构概念的核心是不分配约束原则，即非盈利机构不能给它的任何控制人分配利润。但是，非盈利机构也是需要经营并通过经营来收回成本并争取盈余的，只不过其盈余不能作为营利分配到个人罢了。因此，孔子学院虽为非盈利机构，但一定要经营好。此外，汉语国际传播是一项长远的事业，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把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评估的重要方面。因此，评估指标体系应能充分反映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办学能力。

5. 定量为主原则。评估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但为了客观反映各孔子学院的办学状况，要尽可能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明问题，所以，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定要充分体现定量为主的原则。

6. 激励性原则。评估指标体系既要客观反映孔子学院办学的全面情况，同时还要注意对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给予较大倾斜，以鼓励各孔子学院积极拓宽筹资渠道，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提升辐射影响力。

7. 共性与个性兼顾原则。评估指标体系应涵盖全球孔子学院的共性特点，但由于国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往往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评估指标体系要同时兼顾共性和个性问题，对符合孔子学院办学宗旨而又具有独特个性的孔子学院办学项目设立开放指标，给予加分。

8. 简明可操作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要充分

考虑孔子学院提交材料的方便，同时便于定量计分，不宜太细太繁，要充分体现简明和可操作原则。

9. 重点突出原则。孔子学院工作纷繁复杂，评估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抓住主线，突出重点，把握关键。

10. 相对比较原则。评估指标体系不设及格线，不定各等次的具体标准，评估结论根据相对比较情况而定。通过横向比较，达到相互学习、相互激励、共同进步的目的。

## 二、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孔子学院评估的指标体系应涵盖孔子学院办学的主要方面，主要遵循关键绩效指标确立的SMART原则，即，明确具体（Specific）、可衡量（Measurable）、导向性（Action-oriented）、切实可行（Realistic）和时间资源限制（Time and resource constrained）。明确具体是指绩效目标要针对具体的工作目标，要明细化、具体化；可度量是指指标可量化，相关数据信息可获取；导向性是指绩效目标应该具有行为导向性；切实可行是指指标所反映的绩效目标是切实可行，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时间资源限制是指绩效目标应该是受时间和资源限制的，绩效指标中要设定时限，要考虑资源消耗，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考察绩效。

基于以上基本原则，确立以下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共包括10个一级指标、52个二级指标。（见下表）

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分值及评分标准	得分
一 办学 指导 思想	1.1	学院定位	办学层次、生源、范围、特色等	学院定位恰当 2分	
	1.2	办学思路	质量意识、品牌策略、营销策略、规划计划、年度总结	办学思路清楚，符合实际 2分	
	1.3	汉语推广思路	教材、教师、教学法、教育技术、影响区域	汉语推广思路针对性强 2分	
	1.4	中国文化传播思路	此指标为开放性指标，不作限制	有符合实际的思路 2分	

二 和谐 程度	2.1	增进校际交流情况	师生交流、教学科研合作、管理人员友好往来	每个实质性交流项目 1 分	
	2.2	孔子学院中外双方和谐程度	职责划分、决策机制、友好和谐程度	关系友好和谐 1 分	
	2.3	学院领导与师生和谐度	领导与教师, 领导、教师与学生关系	关系友好和谐 1 分	
三 管理 机制	3.1	理事会活动情况	理事会是否定期开会讨论学院发展重要问题	召开一次会 1 分	
	3.2	制度建设	学院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很健全 5 分, 没有 0 分	
	3.3	财务管理	收支管理、审批制度	很规范 5 分	
四 办学 条件	4.1	办学场所	教室、办公室、图书室	优 2 分, 良 1 分, 差 0.5 分以下	
	4.2	设施情况	多媒体设施、办公现代化程度	优 1 分, 良 0.5 分	
	4.3	教师队伍	数量、综合素质	优 2 分, 良 1 分, 差 0.5 分以下	
	4.4	管理队伍	数量、综合素质、能熟练使用所在国语言或通用外语	优 2 分, 良 1 分, 差 0.5 分以下	
五 影响 力	5.1	媒体报道情况	报纸、电视、广播、网络	每正面报道 1 次得 1 分, 负面报道情况属实 1 次扣 1 分	
	5.2	对社区及其他地区影响	在社区的知名度、影响范围	有明显影响得 1 分	
	5.3	校内地位及影响	列入所在学校组织机构、网站	列入组织机构得 1 分, 入学校校园网得 1 分	
	5.4	网站建设	中文、所在国家语言网站	一个语种网页得 1 分	
六 汉语 教学 情况	6.1	学生人数 (折合成“标准学年人”, 简称“学年人”)	标准学年人 = (学习人数 × 学习天数) ÷ 160 天, 相当于 1 人学习 8 个月, 即 20 天/月 × 8 个月 = 160 天。每 4 小时教学折算为 1 天。	每 1 学年人 1 分, 上不封顶	
	6.2	培训本土汉语教师数 (标准学年人)	标准学年人 = (学习人数 × 学习天数) ÷ 160 天, 相当于 1 人学习 8 个月, 每 4 小时教学折算为 1 天。	每 1 学年人 3 分, 上不封顶	
	6.3	汉语考试	考试种类、参加考试总人次	每 100 人次得 1 分	
	6.4	教育技术应用情况	使用多媒体课件、音像资料、网络资源、广播电视等	普遍使用 2 分, 部分使用 1 分, 不使用 0 分	
	6.5	教学法创新情况	教学方法、教学模式	每项创新 1 分	
	6.6	本土化教学资源开发情况	教材、教辅资料	每册 5 分	
	6.7	向其他汉语教学机构提供教学资源情况	资料共享、师资支持等	每支持 1 个教学机构 3 分	
	6.8	教学质量学生评价结果	学生对教学质量问卷的无记名反馈	优秀 9—10 分, 良好 7—8 分, 一般 6 分, 不满意扣 1—5 分	
	6.9	教学质量专家评价结果	专家以听课、访谈、问卷等多种形式主动调查了解教学质量	优秀 9—10 分, 良好 7—8 分, 一般 6 分, 不满意扣 1—5 分	
	6.10	单位时间内教学效率专家评价	专家对单位时间内学生汉语学习成绩及其反映出的教学效率作出评价	优秀 9—10 分, 良好 7—8 分, 一般 6 分, 不满意扣 1—5 分	

七 主办 文化 推介 活动 情况	7.1	校内中国文化推介活动情况	30人以上	每次1分,上不封顶	
	7.2	面向社区中国文化推介活动	30人以上	每次2分,上不封顶	
	7.3	面向县/市中国文化推介活动	30人以上	每次3分,上不封顶	
	7.4	面向全州/省的中国文化推介活动情况	50人以上	每次4分,上不封顶	
	7.5	面向全国中国文化推介活动	50人以上	每次5分,上不封顶	
	7.6	跨国文化学术活动	50人以上	每次6分,上不封顶	
八 运营 情况	8.1	办学收入情况	学费、报名费	每10万元加2分,上不封顶	
	8.2	总部项目经费	各种专项经费	每10万元加1分	
	8.3	总部投入人员经费	院长、专任教师、其他管理人员薪酬、补贴、国际差旅费等人员经费	此项不加分	
	8.4	外方学校投入经费情况	以货币形式进入学院收入账的经费	每10万元加1分	
	8.5	争取捐赠、赞助情况	活动赞助、机构或个人捐款	每1万元加1分,上不封顶	
	8.6	学院总收入	各项收入总和	每50万元加2分,上不封顶,不足50万元的不计分	
	8.7	学院盈亏状况		每盈余1万元加2分,上不封顶	
九 获奖 情况	9.1	优秀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总部评出	加5分	
	9.2	优秀孔子学院院长		加5分	
	9.3	孔子学院优秀教师		加5分	
	9.4	其他重要奖励		每项加1分	
	9.5	其他重要业绩		酌情每项加1分,上不封顶	
十 负面 影响	10.1	学院被总部通报批评		扣5分	
	10.2	院长或教师被总部通报批评		扣5分	
	10.3	财务管理不规范		视情节轻重,扣1—20分	
	10.4	由于工作失误卷入法律纠纷		每个案子扣10分	
	10.5	资金资产损失		每万元扣2分	
	10.6	损害孔子学院声誉		视情节轻重,扣1—20分	

上述10个一级指标基本覆盖了孔子学院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52个二级指标则覆盖了孔子学院日常管理和办学的基本活动,成为考评指标体系中的基本支撑点。在对52个二级指标进行量化打分的基础上求和,即可得出被评估的孔子学院的总得分。考评指标体系不规定及格、良好、优秀分数线,评估结论通过相对比较得出,共分四档: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各个等次名额不硬性规定,可授权考评专家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说来,对

同类孔子学院成批进行评估时,前20%为优秀,往下50%为良好,办学情况违背孔子学院宗旨或出现重大问题或未能履行孔子学院办学职责者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指标体系中的计量单位“标准学年人”需要作如下补充说明:“标准学年人”是本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一个新的计量单位,主要用来衡量一所孔子学院一年或若干年内完成的汉语培训工作量。一个标准学年确定为8个月,如果1个人在孔子学院接受



了8个月的汉语培训，则这所孔子学院便会增加1个学年人的培训工作量。有了这个计量单位，就可以把不同孔子学院完成的长短不等的培训工作和人数折算成相同的计量单位，从而使不同孔子学院完成的不同汉语培训工作量具有可比性。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学生接受汉语教学的时间往往又是以课时为计算单位的，所以，可规定每四学时的教学折算为一天的教学时间，但一天超过4学时的，不论超过多少都只能算一天。根据以上两种情况拟定两个计算公式：

标准学年人 = (学习人数 × 学习天数) ÷ 160天

标准学年人 = (学习人数 × 学习总课时数 ÷ 4学时) ÷ 160天

以每周学习5天，每月学习20天，每学期为4个月计算，两个学期的学习时间为8个月，折合为实际学习天数为160天。此天数已扣除了可能出现的每月约两天的节假日。例如：40名学生在某孔子学院学习汉语40天，该孔子学院所得的标准学年人为10个学年人，相当于10个人学习了一学年。计算方法如下：

$(40人 \times 40天) \div 160天 = 10$  学年人

又如：某孔子学院办了一个每天上20学时课的业余班，共安排了10周的教学，共有100人学习，则该孔子学院通过此项目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为：

$(学习人数 100人 \times 20课时 \times 10周 \div 4学时) \div 160天 = 31.25$  学年人

由于培训普通学生和培训汉语教师的难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规定培训1个学年人的普通学生得1分，而培训1个学年人的汉语教师得3分（乘数3）。

### 三、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的特点

本文中建立的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在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的10个一级指标中，一至四为封闭性指标，设定了最高分值，使其分值在孔子学院总分值中的权重受到合理限制。但五至十为开放性指标，分值不封顶，可根据办学业绩和指标体系中规定的计分标准来进行计分。

2. 激励多劳，上不封顶。在本指标体系中，在影响力、汉语及中国文化教学、文化推介、运营状

况等反映孔子学院办学状况的重要方面，都按办学情况累计加分的办法计分，充分体现了激励多劳、上不封顶的原则。

3. 汉语教学为主的鲜明导向。本指标体系中把汉语教学放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并在分值上充分体现。通过“标准学年人”的创新计量单位，把所完成的原来以不同计量单位计算的汉语教学工作量折算成可以进行比较的统一的计量单位，通过两个公式使以课时计量的和以天数计量的教学工作量都得以顺利转换。在鼓励各孔子学院举办各类汉语培训班的同时，这项指标还会起到鼓励举办长期汉语学习班的作用。为了充分体现对教学方法、质量、效果、社会声誉及学生评价等内涵指标，在第六个一级指标下，专门列出了教育技术应用情况、教学法创新情况、教学质量学生评价结果、教学质量专家评价结果和单位时间内教学效率专家评价等指标，并将每一项的分值设为1—10分，大大提高了上述汉语教学内涵指标在整个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从而引导各孔子学院逐渐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塑造良好品牌方面。

4. 可持续发展导向。本指标体系把运营状况作为一项一级指标纳入评估体系，其目的在于引导各孔子学院重视生存能力的培育，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5. 评估周期的灵活性。本评估指标体系可适用于不同周期的孔子学院评估，如年度评估、院长任期评估、三年评估、五年评估等。不论周期长短，本指标体系均能适用。

6. 此评估指标体系为“导向性评估”。孔子学院虽为语言教学项目，但并非普通的语言教学项目，而是特殊的语言推广项目，因此，把对其他普通语言项目的评估理论和模式照搬到孔子学院的评估肯定是不合适的。本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自始至终贯穿着鲜明的导向性。这种贯穿始终的导向性可以提升为一种理论，即导向性评估理论。所谓“导向性评估”，是指评估的目的是导向性的，评估是为了引导评估对象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导向性的，通过指标体系的封闭与开放、分值的高低、加分与扣分等指标引导评估对象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评估的结果也是导向性的，评估不设绝对标准，通过相互比较确定评估对象达到的水平及其与其他孔子学院的差距，让所有孔子学

# 试论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制度化建构

袁 礼

## 一、引言

华人移居海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目前，约有4800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华侨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不同形式的华文教育活动。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华文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越显重要，华文教育又开始被世界各国广泛重视，“汉语热”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中国古代儒家代表性人物圣人孔子为名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近几年，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截至2009年7月，已经启动建设了331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83个国家和地区。近五年来，海外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其制度建设密不可分。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17号）颁发实施；2007年，孔子学院实行总部理事会议事决策制度；2008年，推出《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和《国际汉语教学通用大纲》，为国际汉语教育提供质量标准。2009年，网络孔子学院上线，构建了国际汉语教育的远程教学与开放式学习体系。设立孔子学院奖学金制度，为外国汉语教师来华研修、攻读学位提供资助。在此基础上，《孔子学院章程》规定了全新的“因地制宜”合作方式，旨在建设不同类型与功能的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形成辐射作用的国际汉语教育骨干体系。这一系列制度的推广实施，突破了“以我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价值架构，促进了海外华文教育以及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国际语言推广模式建设的新层面，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突出表现在：以孔

院都明确努力方向，从而达到相互促进、不断进步的导向效果。此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对不同孔子学院个体的评估建立横向参照体系，以量化的形式呈现各孔子学院的办学情况，引导各孔子学院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以实现可持续发

子学院为龙头，汉语国际推广按照“彼需我动、对等合作、积极援助”的发展思路，逐步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科学之路迈进，越走越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汉语教师及教学志愿者遍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学好中国话，朋友遍天下”（Learning Chinese Double Your Friends）的宣传理念，使孔子学院形塑了中国友好使者的优良形象，增进了国际理解和中外人民友谊，营造了和谐的中外人文交流氛围，孔子学院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字、了解当代中国的主要平台，甚至成为中国“大外交”和“大外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品牌之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把“支持孔子学院建设”“支持国际汉语教育”作为今后十年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任务项目之一。为认真落实《纲要》精神，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动国际汉语教育与推广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主题，制定短期实施方案，着力推进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规划设计与制度建设工作，其中之一是“编制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与推广工作十年规划”。但是，实际上目前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中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研究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制度化建构就显得更有意义。

## 二、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发展

当前，国际汉语教育可分为两个层次：狭义的国际汉语教育（是指对华侨华人进行中华语言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广义的国际汉语教育（是指对中国人与外国人进行中华语言、文化、宗

展，最终达到树立正确导向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导向性评估理论”的核心要素。

（吴应辉，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81）

（原文刊载于《教育研究》2011年第8期）

教、民俗、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直接或潜移默化教育)。国际汉语教育最早起源于华侨教育,海外华侨身在异邦,心怀祖国,他们担心自己的子弟生在海外、长在异域而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文化,于是便效仿国内的教育形式,开办私塾,进行祖国语言文化的教育。这种早期的国际汉语教育形式随着岁月的变迁缓慢的发展着,直至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汉语教育服务作为国家贸易的一种,加快了对外输出的步伐。中国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机构,虚心吸取各方成功的办学经验,另一方面也大力地对外进行华文推广,或者与当地合作办学,或者独资办学,走出了一条特殊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汉语教育推广之路——在各国兴办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孔子学院已经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不仅将它作为学习汉语的场所,而且把它作为近距离了解当代中国信息的窗口,作为与中国进行教育、文化、经济、贸易等交流合作的平台。”孔子学院的兴办具有以下几个显著作用:第一是促进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孔子学院作为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国际汉语教育的一个崭新的形式与平台,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国国际汉语教育与汉语推广的力度,而且对促进中国与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第二是文化传播。中国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而孔子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于海外普通民众来说,孔子就意味着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利用孔子的形象进行对外汉语推广,对传播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第三是推广和平外交政策。孔子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的推崇者,他主张“和谐”“和睦”“和平”,强调“和合之境”“和而不同”,这正是我国外交所奉行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基础。诸多事实充分证明,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促进孔子学院产生与发展,孔子学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国际汉语教育与孔子学院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促成汉语国际推广、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这一伟大事业。

### 三、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制度化构建面临的主要问题

1. 缺乏文化产品符号。缺乏文化产品符号,成为文化传播硬伤。当前中华文化还算不上强势文化,对于大批量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的应对能力往往显得十分脆弱。在诸多的情势下,我们的孔子

学院的正常发展经常被西方政客作为“文化入侵论”“软实力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等的借口。而英文在全世界“肆虐”几个世纪,我们却很少听到极大的负面评价。这从一个侧面映衬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窘境:那就是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向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一样明显的本民族文化标签,例如美国大片的肆虐,日本动漫的大举入侵,韩国的肥皂剧充斥荧屏等等,他们的文化传播阻力非常小,也很少作为西方政客的靶心。鉴此,中华文化一定要寻找更多能够代表中华符号的载体,通过这些载体将中华文化渗透入各国的文教系统之中,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中华文化,产生与“哈韩”“哈日”同等的现象效应,堆积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良好国际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作用比较明显,因此,如何更好发挥制度建设的推动作用成为当前孔子学院和国际汉教的重要课题。

2. 缺乏海外汉教师资及管理型人才。当前中国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师资来源仍然居多靠我国的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这些师资都不甚稳定,他们都是1—2年,3—4年等阶段性海外教学,许多教师无法长久从事海外汉语教学工作,师资的来源无法稳定,更谈不上加大老人与新人之间的工作有效传承。这也导致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教师的日常工作多年来都始终在原地踏步,制度上的创新更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管理、营运人员,对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建设和推广始终无法创设一个新的局面,特别是在一些小语种国家,具有对外汉语教学管理经验的师资更加难找,许多管理型的人才始终都疲于应付教学,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做好文化推广这一重任。因此,如何从制度建构方面提高孔子学院的运作效率,使孔子学院的发展具备良好制度保障显得十分迫切。

3. 缺乏合适的教材及教学模式。汉教教材陈旧甚至没有。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非常陈旧,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在使用当年台湾所提供的繁体教材,有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甚至连教材都没有。目前能算的上有双语教材的语种为数不多,质量和数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对外汉教事业的科学发展。例如,在俄罗斯绝大多数高校使用的教材仍然为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汉语学家编写的教材,姑且不谈教材涉及的语法内容,单单从教材编写的年份来看,很多内容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诸如“公社”“生产队”“游击队”这样的词汇,依然是现今广大俄罗斯学习汉语的学生必须背诵的,由此可见其质量的拙劣程度。

另外，教学模式单一，甚至有的还不适应当地人的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中国汉语教师在海外的教学沿袭的是中国的传统教学方法，如家庭作业、考试方法、上课规则等等。这些方法根本无法让外国学生接受，即便是一些在中国的对外汉语课程上屡试不爽的要求和标准，到了海外也会失效。我们的汉语教师尽管有着很丰富的汉语教学经验，但是对于外国人学汉语的特点以及所在国的语言环境掌握不够到位。他们往往把在国内的那一套照抄照搬到境外。而事实上，在境外教汉语同在国内教汉语完全是不一样的，甚至在中国教外国学生汉语同在外国教外国学生汉语的方式方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4. 海外汉教发展有待进一步规范。据了解，现在在亚洲各国的孔子学院数量比较多，例如韩国的孔子学院已基本饱和。但是在欧美国家，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还很少。而学制更有待进一步规范。有的国家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学分尚未获得学校或政府的承认，居多处于选修课的状态，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多数孔子学院的教学主要采取业余培训和进修的方式，一部分孔子学院进入所在国的大学或中学课程体系，但是，由于汉语课程只能修习一个学期，学生刚培养起兴趣之时，课程就结束了；甚至有的孔子学院只能“沦落”到跟一些当地的中文学校或者华人社团联合，成为所在国私人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部分，面向的对象也仅是华人子弟，国家正规的孔子学院“沦落”到私人教育机构的一部分，派出去的教师也成为了“打工者”。可想而知，学制的规范性根本无法维系。教师流动性过大、学生流动性过大同样对学制的规范也起到了负面作用。因此，检视如何从制度建构方面加大国家对孔子学院和国际汉教事业发展的有效、良性干预，提高我国对外汉语教育的传播品质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历史任务。

此外，诸如资金来源过于单一、硬件亟待补充、远程教学基础薄弱、漠视文化差异、学习者缺乏忠诚度等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良性发展。故此，探索对受众研究、独立运行、质量监控、年度评价、师资投入、盈利投资以及多方参与等制度化的设置研究，强有力推进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科学发展，争抢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话语权显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 四、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制度化建构政策建议

1. 受众研究机制。受众研究是指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传播如何更有效的把握所在国的学员

及其特点，进而建立起一套研究所在国文化及其受众的制度体系，充分认识所在国文化与中华文化差异，加强对学员现况的研究，以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效率，深化中华文化对电影、动画、网络等普适性符号的浸润，为提高孔子学院运作和国际汉语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奠定基础。

2. 独立运行机制。首先是提高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办学的准入机制，构建孔子学院和汉语教育办学工作的体系，严格按照酝酿、筹备、建设、成立、运作、监控、反馈等步骤，建立一套孔子学院设立和运作的制度。二是完善教师准入制度，虽然目前师资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但是，一开始将外语熟悉程度、普通话水平、教学能力水平等设置一定的制度标准，只有通过者才能执起教鞭，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规范质量标准。三是构建汉语教材研发与推广工作及其认定（认证）制度，针对教材缺乏和教材参差不齐的情况，我们要尽早建立一套汉语教材研发和推广的工作认证制度，科学规划汉语教材，逐步提高教材质量。四是着重完善不同功能的孔子学院会议工作机制及议事规则，如考虑孔子学院地区联席会议，科学（比如按语言地图）划分片区，增进共同语言的深入沟通、交流与合作等等。五是总部理事会建立部分常务理事的专职制度，增加理事会会议次数，实行理事会重要决策的宣讲责任制度。六是孔子学院年度大会在交流情况、分享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具有适度开放、保障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的高级代表议事机制与资深院长辩论制度，以推动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工作创新和政策研究。

3. 质量监督机制。当前孔子学院有三种设立方式，即：国内外机构合作、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总部直接投资。因此，笔者建议：第一，按照三种不同的设立运作模式，及时建立质量监控机制，在孔子学院的筹备、建立和运作的整个过程中引入质量监控体系，有效地推进孔子学院运转质量的提升，有力提高孔子学院的质量化管理水平。第二，在条件具备的国家中，进一步引入该国的教学质量监督，有效提高质量监控的运作透明度、尤其是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办学透明度，减少外国政客对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误解甚至污蔑。第三，加强与所在国教育机构的合作，争取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运作能够逐步上升到该国的国民教育序列之中，避免因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身份无法“合法化”而遭到别有用心政客之无端质疑和攻击。第四，在前面三者都基本能够达到的前提

下，可逐步探索在对我友好、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发展较好的国家推行国际化标准制度，为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建设“穿上”合法的外衣，提高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建设的国际化程度。

4. 年度评价机制。根据孔子学院建设和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现状，笔者建议建立和完善《孔子学院建设和国际汉语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下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作为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重点方向和考评依据，建议遵守四个原则：一是与国际汉语教育方向一致的原则，体现办学或支持办学的工作方向及价值目标，反映国际汉语教学（包括华文教学）及学习者的基本要求。二是客观求实的原则，正确区分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国别、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海外华文教育形成的本地化特点，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评价制度。三是完整配套原则，指标体系应着眼发展，反映评价国际汉语教学（包括华文教学）的质量要求、管理目标，反映办学能力、教育水平及评价内容等方面的制度及体系。四是重绩原则，就是在衡量办学特色、教学能力、教育层次、创造性等诸方面的实际成绩及其综合反映中要占有主导地位，全面、客观的体现办学的实际成效，树立国际汉教办学的标杆。另外，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是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主导国的影响力，及时对各国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水平进行3~5年度为一个周期的发展评估，形成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评价机制，通过评价机制有力敦促各国重视提高汉语教学质量，造成你追我赶的局面。通过评估，我们逐步将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加以复制、推广；针对发展相对落后、薄弱的国家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避免了平均用力，耗费资源。

5. 师资投入机制。在师资投入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战略。首先，“走出去”机制是指我们要派遣水平高的汉语教师到国外的孔子学院等机构任教，国家应主动提高教师的待遇，让对外汉语教学的事业真正成为授课教师的终身事业、终身爱好。还要加大志愿者方面的投入数量，逐步提升外派志愿者的质量，增强志愿者的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等。其次，是“请进来”机制的建立。将从事对外汉教的外籍教师引进国内进行资质提升，强化各国汉语教学人才的造血功能，建立对外汉教资质的认证制度，加大对外籍汉语教学人才的培训工作和认证工作，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事业不可能单靠中国一国之师

资就能够完成的，他需要在中国的主导下吸引世界各国政府及师资的有效介入。

6. 盈利投资机制。据笔者考证，世界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都停留在公益性事业的阶段，使得外国企业资本流入、国内私人资本投入、侨资注入等没有明显的积极性。因此，笔者倡导在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经营中适时适度的引入盈利机制，在保证中国政府对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运作的有效监控和主导支配的前提下，适当构筑资金盈利的模式，以起到刺激外国企业资本、国内私人资本、侨资等对国际汉教事业的兴趣，有效缓解当前世界各国在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资金短缺问题。另外，现在特别是许多东南亚国家，在其国家教育发展过程中往往出现了三语、甚至多语的贵族学校，他们目的不外乎有效提高本国人口的国际就业竞争力，主动积极的参与中国经济，以便从中分到一杯羹。这一现象也昭示我们要利用国际潮流和地区发展趋势，适时推广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

7. 多方参与机制。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下设的日常办事机构，是挂靠在教育部的司局级事业单位。但是仅靠教育部的参与是无法完成这样庞大的文化输出工程的。因此，我们要抢抓当前国际汉教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健全国内中央、地方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统筹国际汉语教育方面的组织领导体制、工作协调机制与投入保障机制，最重要的是完善两种资源统筹，避免内耗。一是推进国内汉教资源统筹制度化。统筹教育部、文化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家旅游总局等中央机构和地方各级机构的职能，进一步理顺目前存在的类似于“大部制”+“战线指挥法”的管理体制、“赎买制”+“协商合作法”的工作机制，严格厘清各参与方的责、权、利，构筑稳定的投入保障制度，完善我国汉教体制机制。二是推进国外汉教资源统筹制度化。作为海外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主体和主导国，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汉教资源优势，及时敦促和游说各国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对汉语教学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政治责任和扶持意识，切实提高各国各类学校、文化企业、社会中介机构等文教传播组织参与共同作业的实际能力，将与各国政府、企业、高校、中介机构等的合作制度化，推进汉教逐步进入各国国民教育的序列，取得合法的推广身份。在此基础上，建设国际汉语教育学位培养点和教师培训基地、汉语教材国际发行接续区、汉语教学资源研

# 议孔子学院对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

严晓鹏 郭保林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基本趋势,成为“高等学校管理、规划、培养目标和课程的一种中心因素”。孔子学院作为汉语国际化推广的重要品牌,其独特的中外合作设置、运营模式使其除了为全世界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外,还成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中、外合作高校国际化交流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本文将以浙江省的一些高校为例,说明孔子学院对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影响与作用。

## 一、孔子学院对高校师资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

师资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只有师资国际化才能给学生带来国际化的思维与视野。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往往有高度国际化的教师。师资的国际化不仅体现在国际化师资的量上,更体现在师资的质上。它不能是简单地增加几张异国的面孔,而是要争取得到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水准的优秀教师。就目前国内的实际来说,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要求大部分教师具备国际化师资的资质显然不现实,我们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建立恰当的国际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因此,各高校在师资国际化进程中,

除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外,更重要的还是发挥高校自己的造血功能,让业务过硬、素质全面的教师到国外去接受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具备国际视野、国际修养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

各高校可以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个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平台,让外派教师到孔子学院进行教学与交流。外派教师到孔子学院后,通过与它们的教师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在服务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拓展自己的国际化视野,提升自己的国际化修养。在外派教师的同时,要善于利用合作举办孔子学院的国外高校的资源,把国外高校的教师引进国内,为学校师资国际化开拓一条新的途径。浙江师范大学在成立非洲研究院之后,教师们凭借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这一平台,与该大学的教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非洲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先后承担了外交部、教育部、国家汉办的众多非洲研究课题,其中还包括国内首个非洲领域的国家重大攻关课题。浙江科技学院与罗马尼亚克鲁日大学共建孔子学院,该校在派遣教师赴罗马尼亚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引进克鲁日大学能用英语开展教学的经济类师资,为学院经济类专业外国留学生授课。

## 二、孔子学院对高校学生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

学生国际化主要是指招收外国学生或本国学生

发与推广基地,不断创设各国有序参与国际汉语教育的新途径,建构合理、有序、高效、双赢的国内外汉教资源统筹制度。充分发挥资源统筹的制度话语权,调动各国教育机构与民间力量参与的积极性,把汉语言文化纳入国际公民教育课程和国际理解教育范畴,进一步形成具有国际范式的质量标准体系,形成传统对外汉语教学、战略性孔子学院与新兴国际汉语教育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 五、结语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国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与中国交往的需求日益增强,全球“汉语热”还会持续升温。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交

流的一个知名品牌、一个重要实践载体,与海外华文教育相得益彰。我国政府已经将汉语文化的国际推广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虽然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制度化面临不少问题与困难,相信在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下,努力突破制约汉语教学国际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在管理理念和方法上继续创新,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制度化推进会更加迅速、更加规范,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前景必定更加美好!

(袁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

(原文刊载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前往他国就读，包括长期和短期停留，前者多为了取得学位，后者多属于交换或游学性质，主要在于获得文化经验和语言能力。目前，大力开拓留学生市场已成为欧美高校发展的共同策略。据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留学生一般占学生总数的13.4%，研究生的比率更高，约占29%。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高校本着加强“对国际开放，面向世界，加强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各国高等教育之长，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理念招收外国留学生。

在招收外国留学生过程中，孔子学院对国内、外合作高校具有积极的影响：一是直接的影响，即国内孔子学院合作院校通过孔子学院奖学金，直接吸引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到国内学习与交流。这些留学生大都具有一定的中文基础，因此他们来到中国后能很快与国内的学生打成一片，在提升自己汉语水平的同时，也给国内学生带来了国际的气息与活力，促进了国内学生的“校本国际化”。浙江大学通过征集大学生、研究生志愿者，一对一为参加“浙江大学短期留学班”与“中国文化之旅”的孔子学院学员提供帮助。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得到了拓展，国际修养也得到了提升。二是间接的影响，孔子学院的学生在中国学成回国后，会把自己在国内学习、生活的情况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在国内进行宣传，由于孔子学院奖学金的学生都是成批量的，因而他们的宣传就有群体效应，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到国内孔子学院合作高校留学。除此之外，孔子学院还是国内高校在孔子学院所在国推介自己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而促成更多的学生来中国求学。2009—2010年度，共有38名泰国留学生申请到孔子学院奖学金，来温州大学学习汉语，这批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汉语专业课程学习，已经能够运用汉语进行较高层次的学习、工作和交际活动。在一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泰国留学生与温州大学的众多学生朝夕相处，共同学习与交流，让许多中国学生在国内就较深入地了解了泰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实现了“校本国际化”。同时也扩大了温州大学在泰国的影响力，推动了温州大学学生国际化的发展。

### 三、孔子学院对高校管理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

国际化的大学不但要有国际化的师资、国际化的学生，更要有国际化的管理。高校管理国际化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学校的办学机制、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水平及管理效率都必须适应国际化发展这一形势与目标。

作为中外交流与合作重要平台的孔子学院，按照其章程，要派中方院长到孔子学院与外方院长一道进行管理。中方院长在对孔子学院管理的过程中，通过与外方院长、外方相关管理人员的沟通与合作，可以拓展自己管理国际化的视野，提高管理国际化的能力。同时，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中方院长可以立足国际大背景，制订出符合孔子学院发展的战略规划，或者做出重大决策，在这此过程中，获得宝贵的国际化发展经验，此其一。其二，孔子学院学生来到国内高校学习中文，必然带来留学生管理的问题。留学生在文化、政治、宗教信仰方面与国内学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这就要求对留学生的管理必须是国际化的管理，以国际化管理来满足留学生的多种需要，促进留学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学校生活，提高留学生在国内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在管理当中，中方相关人员通过总结管理经验，自身的国际化管理水准也能得到相应地提高。浙江师范大学先后与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及乌克兰卢甘斯克国立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目前，学校已经拥有了专任教师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教师队伍，派出的院长和教师通过与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与教师的交流与合作，管理的国际化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至今，浙江师范大学共有3位老师获得喀麦隆政府颁发的“喀麦隆金质劳动勋章”，1位老师获孔子学院优秀院长称号。已分别在泰国和美国共建两所孔子学院的温州医学院更是把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位子作为学校培养中层干部的孵化器，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

### 四、孔子学院对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的影 响与作用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高校国际化的灵魂，也是其本质与落脚点。目前，我国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最主要的形式是开发并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通过项目的开展达到促进高校师资国际化、学生国际化、课程设置国际化、管理国际化的目的。

孔子学院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能有力推进中、外双方高校之间的全面合作，让双方实现高校优势互补，从而达到共赢的目的。在孔子学院的管理与教学过程中，中、外双方教师与工作人员通过工作交流与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方工作人员回国后，大都能根据双方学校的特点，力推学校之间合作，达成交流与合作项目，从而加速

学校的国际化进程。温州大学自2008年与泰国东方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以来，努力拓展学生交流项目，提高中文专业联合教育层次。2009年9月两校签署了《温州大学与泰国东方大学合作培养教育项目协议书》，规定了双方在短期汉语交流、中文本科“2+2”、中文本科“3+1”、中国研究专业硕士学位联合培养等项目的合作办学。尤其是中国研究专业硕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温州大学不仅帮助东方大学设计培养方案以及课程设置，还定期派遣专家教授赴泰国讲授主要课程。学生在泰国东方大学完成2年的学习计划后，前往温州大学完成1年的学习计划，将分别获得温州大学和东方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双学位）。教育项目协议书的签订，为双方开展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两校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的深化。浙江工业大学也积极利用孔子学院的作用，在2009年与孔子学院合作院校——美国瓦尔普莱索大学就两校通过“3+2”“3+1”方式联合培养学生、开展学分互认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为两校进一步开展相关的交流与合作打下基础。在2010年举办的冰岛极光孔子学院理事会上，宁波大学与冰岛大学一致同意，要大力推进两校间的交流项目，以吸引更多的冰岛学生到宁波大学学习交流。

#### 五、孔子学院对高校“软实力”的影响与作用

“软实力”（Soft Power）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主要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传播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高校“软实力”包括大学文化的生命力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学科引领的创造力和办学

理念的吸引力、师生关系的融合力和教育规范的控制力、国际标准的导向力和国际形象的赞赏与认可程度等。有学者在对高校“软实力”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高校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同等重要，它们一起对高校的综合实力产生影响。因此，在高校国际化过程中，提高高校的“软实力”不但有利于提高学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提高学校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还有利于提升学校的国际标准导向力，提升学校的国际形象。

孔子学院作为合作中方学校在国内外的窗口，其建设与发展直接影响到孔子学院所在国对中方学校的认知、理解、接纳与推崇，影响中方学校在国内外的竞争力与导向力。目前，浙江省各高校都比较重视孔子学院对学校“软实力”的提升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学科与专业优势来促进孔子学院的建设，同时也利用孔子学院的辐射与宣传作用来提升高校的“软实力”。温州医学院在与泰国东方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后，充分发挥本校的资源优势，将医学文化特别是中医文化引入孔子学院的建设当中，帮助泰方建立中国传统医学中心，并在泰国开展患者咨询、中医知识宣传、中医诊疗等活动，在泰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得到了泰国人民的肯定，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提升了学校在泰国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增强了学校的“软实力”。杭州师范大学利用自身艺术教育的特长，在杭州师范大学——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上，举办了名为《风从东方来》的专场演出。演出不但展示了绚丽的中国文化，同时展示了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的特长，扩大了学校在美国的影响力。

（严晓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温州大学国际合作学院院长，浙江温州 325035；郭保林，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浙江温州 325035）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1年第6期）